

學史勉文仲論
集



岑仲勉史學論文集

岑 仲 勉 著

中 華 書 局

岑仲勉史學論文集

岑仲勉著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怀柔茶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25¹/₂·印張·1插頁·580千字
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00冊 定價：16.45元

ISBN 7-101-00669-8/K·288



先生 勉 仲 琴 像

前 言

岑仲勉先生精研隋唐史，擅長運用名物、制度、地理、碑石、掌故等方面資料，比對考證史事，功力深厚，成就突出，聲譽卓著。除已經出版的多種專著外，他生前所寫關於唐人文集、唐代典籍的考據文章，關於經濟史、民族史、地史學領域的論文，尚有相當份量，還沒有彙集成書刊行。近幾年，我刻意着手蒐求先生的遺文，得數十種，約計九十餘萬字。本着採擇貴精，不求泛收的宗旨，遂逐一加以校覈、整理、編次，訂定為《岑仲勉史學論文集》，將先生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撰寫的文章共二十四篇編為一冊，承中華書局接受出版，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。

本冊所編選，乃岑仲勉先生對唐代陳子昂、白居易、賈島、杜佑、李德裕、李商隱等人的身世事蹟及其文集的稽考；還有對多種唐代典籍和唐人筆記文集的校勘、辨偽、補遺、集釋等等。本集有二十二篇文章屬已刊舊作，編校時已在文末注明出處。其余《論李德裕無黨及司馬光修唐紀之懷挾私見》和《重校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》兩篇，係首次發表的遺文。附帶說明，《論李德裕無黨及司馬光修唐紀之懷挾私見》一文，是先生在兩個時期斷斷續續撰述的，泰半寫於三十年代末，弱半撰於五十年代初，尚未綴合完篇。文章贊揚李德裕的主要觀點，已散見其《隋唐史》一書中。今次我把該文的若干段落合併，加以整理完篇發表，編排在《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》之後，供讀者更詳盡地瞭解先生所持論點全貌。《重校

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》一文，寫於五十年代中，係先生依據新資料對已刊舊作《校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》的重新修改，改動較大。全文騰清不久，先生因病逝世，一直沒有發表。本集首次刊出新作，舊作不再重收。

本集的編排，大體上按照文章的類型分成三個部分。每個部分的文章，又根據內容，或刊出時間的先後排定次序。一些文章中偶與學術無關的內容，曾酌加刪節。對於原有行文和排印等方面出現的錯誤與遺漏，編校時已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和補正。先生宏文所徵引各種書籍、刊物，編校時都加上書名引號，以清眉目。值得指出，先生行文往往為簡潔起見，引用書籍，慣用省書之例。如：《舊唐書》簡曰《舊書》，《全唐文》簡曰《全文》，等等，編校時都沒有加以改動。

由於個人能力綿薄，編選文集，遇上種種困難，幸而得到中華書局編輯部的支持幫助，逐一解決。相信，編校工作中疏漏訛錯的地方一定不少，希望讀者惠予指正。

著名中國古文字學家商師承祚教授，以八十四歲高齡執筆為文集封面題字，至深欽感。

這部論文集編輯完竣時，適逢先師誕生一百周年，謹以此作為先師冥壽百歲的紀念！

受業陳達超編校 1981年7月20日於廣州中山大學
1985年夏修改於香港寓所

岑仲勉先生傳略

陳 達 超

岑仲勉先生是我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。他畢生致力於歷史學的研究，生平著作豐富，成就突出，在先秦史、隋唐史、文獻學、地史學和中外交通史等學科領域，均有建樹，造詣頗深，為國內外史學界所推重。仲勉先生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廣東省順德縣桂洲鄉，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病逝於廣州中山醫學院，享年七十六歲。

仲勉先生生長在一個普通的商人家庭，其父祖輩都是開米店的。他自幼受中國古典文化的教育，童年入私塾，誦讀四書五經，聰敏超人，執筆為駢體散文，往往冠其曹輩。及長，私塾不設歷史科，課餘取《通鑑綱目》自行點讀，跟隨堂伯父攻金石刻辭，習而好之，逐步對歷史和史學研究發生興趣。一九〇三年，考入兩廣大學堂（後改名為兩廣高等學堂，即廣州廣雅書院），攻習經史與宋人理學，奮發砥礪，博覽羣籍，深受乾嘉考證學的薰陶，對於高郵王念孫、引之父子考據學方法尤為服膺，遂潛志治史。一九〇八年，進兩廣游學預備科（設在廣州粵秀書院）。一九一二年轉讀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，學習近代科學諸如經濟、數學、外語，初步奠定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，更鞏固地掌握了治學工具和方法。由於他自小就愛好文史，為後來的治史事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。

仲勉先生終生孜孜不倦從事歷史學研究工作，其主要活動分爲三個時期。

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初。仲勉先生在稅務學校畢業之後，本想東渡日本深造，無奈因家境困窘，川資不濟，遂輟學，謀生計。他曾任財政、稅務、郵政等等機關的小職員，受環境限制，他的文史專長未能得以發揮。但由於他自少養成刻苦鑽研的習慣，兼備厚實的古文基礎和對治史的酷愛，工餘之暇，輒潛心研讀各種史書，積累了治學的豐富資料，寫下厚厚數本讀書札記。仲勉先生踏入歷史學領域，最先就是對地史學方面的研究探討。他承受清代道、咸以來學人提倡莊重自強，強調跳脫空疏迂遠的陋習，轉向經世致用的學風影響，特別對西北邊陲地史學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有濃厚的興趣，撰文探討。一九二一年他發表關於地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《課餘讀書記》，即其中試作。國內學術刊物如《金陵學報》、《東方雜誌》、《中山大學史學專刊》等，紛紛刊登岑仲勉對西北史地考證的文章，引起當時史學界的注意。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先生贊賞他的專長，特約他爲《輔仁學誌》撰稿。仲勉先生在這個刊物發表的《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》、《漢書西域傳康居校釋》、《新唐書突厥傳疑注》、《跋突厥文闕特勒碑》等七、八篇，皆方法嚴謹，論斷有識，行文之美，猶其餘事。其間又在《中山大學史學專刊》發表《括地志序略新詮》、《校貞觀氏族志殘卷》、《李德裕會昌伐叛集編證上》、《耶律希亮碑之地理人事》、《秦代初平南越考》諸篇，史實翔實，精心推考，均有新意，備受稱揚。仲勉先生廣泛應用對音方法來考訂邊陲外域古地名，以作爲歷史資料的補充，是他研治地史學的一個特色。雖然他的治史活動不是在專業機構如研究部門或高等院校進行的，但他的研究却取得了非凡的成果。這個時期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不下四五十篇，一九三四年還出版了一本專著《佛游天

竺記考釋》。

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四八年。這時，仲勉先生一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。他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得到陳垣先生的推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。在此期間，治史做學問的條件總比以前優越，得以專心致志從事研究。然而，好景不長，“七·七事變”後，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南京遷往湖南長沙，一九三八年又移往雲南昆明，一九四一年遷抵四川重慶南溪板栗坳，連年奔走，飽嘗戰禍風霜，流離顛沛，不遑寧處。在戰亂中，圖籍分散，能搜集的文獻資料極其有限，給作史學研究帶來很多困難。仲勉先生却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，鏗而不舍，刻苦治學。當時，他致力最勤、成績最輝煌的是對唐代史事的研究和文獻整理。他發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關於唐史方面的大量著述，皆以內容豐富，考釋精密，時有獨到的見解，為並世諸家研究者所推許。其對唐人文集如《白氏長慶集》、《張曲江集》和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詩》的研究考訂，做了細緻詳盡的校證和考釋，爬梳鉤稽，有着尋根問底的索真求知精神，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。仲勉先生對於《白氏長慶集》的研究，創獲甚多，成就突出。《白集》系白居易的詩文總彙，向以編集完整（七十一卷），數量浩繁（三千六百多篇），版本多種（宋紹興本、明馬元調本、東洋那波道園本、清汪立名一隅草堂本）而見稱於世，更由於它具有非常豐富的第一手唐代史料和較高的文學價值，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重視。但是，《白集》成書早，而遇戰禍流散，後來補入詩文，屢加雜僞文字，從而產生集本錯亂不整，真僞難辨的問題。仲勉先生慕白居易為人爽直樸實樂天，就白氏的一生和詩文，作了多方面的探索。所寫論證《白集》的文章，有《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》、《白氏長慶集僞文》、《補白集源流事證數則》、《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銘存疑》、《從文苑英華辨證校白集詩文附按》、《從金澤圖錄白

集影頁中所見》等七篇，約有十多萬字，實可彙成專書。仲勉先生運用自己廣博的唐代歷史知識，提出《白集》的最初編定，收錄在後集的完成時期，考訂《白氏長慶集》編定在唐武宗會昌二年。他持《白集》東林真迹，於唐末或五代初已經消失的論斷。他詢問文集的體例，考究宋代以來傳本諸刻的異同，運用傳世唐代碑志和正史、類書參互校核，指摘今本諸刻所收白居易詩文，大致分爲六類，“第一類，信白氏作品也。第二、三兩類，其中雖有可疑，然未獲強證，吾人不能斷爲非白氏作品，第四至第六類則異是，其必非白氏所作”。其詳審諸刻各有所善，論定明馬元調本優於東洋那波道園本。仲勉先生對《白集》的研究，成一家之言而聞名中外。一九五六年，日本著名學者花房英樹撰寫《關於岑仲勉先生的白氏長慶集研究》一篇長文，對他推崇備至，稱譽岑仲勉的研究多所發現，“實在是充實的著作”。仲勉先生在這個時期對唐代文獻的整理和研究，也取得很高的成就，不少成果超過了前人的研究。主要著述如：《翰林學士壁記注補》、《補唐代翰林兩記》、《登科記考訂補》、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》、《元和姓纂所見唐左司郎官及三院御史》、《唐方鎮年表正補》和《貞石證史》、《續貞石證史》，等等。他對唐代文集的考辨論析，不僅在方法上謹嚴縝密，而且有獨到的見地。他覺得整理文獻和研究，不應停留在考據學的某爲訛字、衍文，某屬錯簡的水平上，爲求得解決文獻資料的真實性，一定要從歷史入手，注重歷史內容，不要抱殘守闕。仲勉先生嘗言：“校唐人文字者，總須參酌史實，然後能定其異同，亦不可因一字之差，遽生誤會。”其視爲治史的“小得”，實乃卓識灼見。仲勉先生撰《元和姓纂四校記》，係繼承林寶《元和姓纂》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部專著。他博采年譜碑志方面書籍，徵輯諸家考證，進行芟誤、拾遺、正本、伐僞的深入校證增補，寫成三大冊，近一百七十多萬字，卷帙浩繁，蔚爲大觀。其

情博之處，為研究唐史和譜學，提供了一部較高學術價值的工具書，至今絲毫不因歲月的流逝而減色。此外，仲勉先生旁及對突厥史的深入系統的探研，對元代西北邊疆史地的考證，對隋唐史事的探索，也作出了顯著的成績，如《突厥集史》、《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》、《隋書求是》、《唐史餘藩》、《唐人行第錄》等書的初稿，都是勒成於斯時。粗略統計，仲勉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，約七八十篇之多，還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了《元和姓纂四校記》，這在同輩學者中是不多見的。仲勉先生曾追憶起他的治史做學問經歷，寫道：“我半途出家，年近四十纔專門從事史學研究，在五十二歲到六十二歲，則是我做學問最努力的時期。”的確，仲勉先生研究隋唐史和中外史地有素，精勵治學，始終不懈，實在是一位勤勉卓越的學者。仲勉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了十一年多，埋頭著述，澹泊明志，守正不阿，後因與該所主持人發生矛盾，藉口所謂研究課題範圍超越合同約束，備受打擊排擠。仲勉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憤然離開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南歸廣東，入中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任教授，開設蒙古初期史，後改授隋唐史，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去世。

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一年。全國解放以後，岑仲勉先生的學術專長得到充分的發揮。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授時，正是六十四歲至七十六歲的老人，健康和精力大不如前，雙手顫抖，寫字東歪西倒，但他却毅力過人，老來彌篤，著述不輟。十一年來，仲勉先生始終既篤於講授隋唐史和培養研究生，又勤於著書立說，一本接着一本未嘗間斷，一個年近古稀的學者，幹勁如此之大，真是難能可貴，堪稱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典範。一九五三年，人民政府提出根治黃河的規劃和措施。仲勉先生本來是一位經世致用的學者，對治理黃河宏偉事業極為關心。他對河源問題、河道變遷問題積累

了大量資料，作了多方面的探研，曾先後發表有關歷代治黃的經驗及其利弊的論文，如《關於黃河遷徙的研究》等，溯源窮本，見解精博，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好評。爾後，他在同事的鼓勵和支持下，於一九五五年寫成《黃河變遷史》一書，共六十多萬字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著述概括元代之前黃河變遷的歷史，詳古略今；闡析歷代治黃的名論與實施，作出了切合歷史面貌的概括和總結。由於本書內容豐富，資料翔實，例證突出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，為治理黃河水利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和借鑑，成為研究我國黃河史的一部重要學術著作。六十年代初，日本學者河野通博撰《黃河河道之變遷——岑仲勉氏之新說彙篇》一文，稱譽仲勉先生的研究富有卓識。河野通博先生於一九六三年應我國文化團體之邀友好訪華時，還特地帶着這本小冊子要呈獻岑仲勉，惜先生已作古人。同期所著《隋唐史》一書，則是仲勉先生講授隋唐史時由講義而演進為專著的。該書全部用淺易文言文撰寫，以期引起學生對古籍的興趣，便於閱覽歷史文獻資料，為以後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奠好基礎，對莘莘學子期致厚望。《隋唐史》雖屬講義教材，但却是仲勉先生積三十多年研究隋唐史事的綜合成果。它的顯著特點是：（1）用專題論文的體裁來敘述隋唐史，係寫專著所少有的。（2）用大量篇幅詳盡分析論評各家各派不同結論的方式，來闡明自己的見解，觀點鮮明。由於全書史料翔實，註解豐富，文字簡明練達，成一家之言，被譽為“是一部很有價值的隋唐史”，廣為流佈。此書自一九五七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出後，不僅被國內各高等院校廣泛使用，遍及香港等地的大學亦選用作教材，坊間有各種影印版本。一九八二年北京中華書局改版重印發行，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。仲勉先生教學態度認真負責，以培養英才為樂事。對莘莘學子既嚴格又熱情，教課時經常早到遲走，以便學生們有充裕時間向他提

問，而他總是耐心地認真答疑，絕不敷衍。仲勉先生誨人不倦，善循善誘，為莘莘學子所尊敬和愛戴。仲勉先生還努力於培養研究生的工作，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，他帶出了兩屆研究生，他們畢業之後在高等院校從事教學和科研，各自取得了較好的成績。仲勉先生雖然年事已高，依然努力學習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，力圖運用唯物歷史觀來解決中國古代史的問題，其在《隋唐史》一書中的一些章節，就是反映了他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。在仲勉先生的遺稿中，還寫有一篇題為《從歷史觀點讀〈矛盾論〉》的文章手稿，也反映了他的學習體會。仲勉先生的學術思想活躍，注意研究新的課題，在黨的“雙百”方針鼓舞和推動下，積極參加中國社會史分期問題、田制與賦稅制問題、農民戰爭史問題的學術爭鳴。對有關學術問題的討論，他既不隨和苟同，也不盛氣凌人，有其鮮明而獨到的見解。所著《西周社會制度問題》一書，闡明中國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時代分界線應定在西周的主張，屬西周封建說學派。所寫《西晉占田和課田制度的綜合說明》、《租庸調與均田有無關係》、《唐代兩稅基礎及其牽連的問題》和《如何探討我國農民戰爭發展的規律》等文章與《府兵制度研究》一書，其見解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。一九五七年，仲勉先生窮年累月的科研成果《突厥集史》（全二冊）和《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》兩書脫稿，於翌年分別由北京中華書局和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。他對古代東突厥汗國和西突厥汗國的歷史，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，把我國古籍、文集、雜著、筆記和碑志中有關突厥資料逐一摘出，按繫年先後或類別編次，運用突厥文物與資料互證的方法，詳盡考釋突厥時代的史事、人物和地理，突厥和隋唐的相互關係，等等。兩書問世後，引起了國內外突厥學研究者的重視，譽其對我國突厥學的發展，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。還有史地學方面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《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》，是

仲勉先生長期研讀《漢書》和旁及清代學者著述的又一成就。他多方鉤稽史料，輯採中外學者的論述，着重在西域各處的重要地名考訂及其歷史沿革，以及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與都城距離的詳細考證，弄清史學界長期以來關於西域史研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，真是仲勉先生嘔心瀝血的心得結晶。此書於一九八一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印出後，國內外西域史研究者反映至佳，認為此書為同期世界各地刊行的三本同類型著作當中，一本極有參考研究價值的專著。一九六〇年，仲勉先生在耄耋之年還完成了《唐人行第錄》和《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》兩書，並交出版社刊行。其中，《唐人行第錄》一書係仲勉先生自一九三八年在雲南昆明時開始輯集，窮二十多年精心考究，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和《文苑英華》中有見必輯，對唐代名人的輩行、官職、經歷進行全面、深入、系統的探索考證，彙集成為一本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唐代文學的人名工具書，給研究唐代文史的人，提供了不少便利，深受廣大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歡迎，曾一版再版。仲勉先生對待著作的出版，一貫持嚴謹的態度，除反復精心修改原稿外，還逐字逐句審正校樣。仲勉先生為人謙遜，從不自矜。他注重廣搜博採史實，加以鉤稽條貫，考據異同，辨別真偽，論證詳細，頗殫心力。其做學問，貴在實事求是，有疑必質，其所不知，則從闕如。力求得論證方面的可信，多據碑志文物傳世事跡，其功力用於注釋尤多精闢。國內外的史學評論，都認為岑仲勉著作材料豐富，考證鎮密和不少論斷具有獨到的見解。雖間有瑣碎繁雜的弊端，可商之處亦不少，然小疵不足掩大醇。仲勉先生晚年，治學宏願依然未減。一九六一年上半年，他應某出版社函約撰寫關於唐代進士、翰林、郎官方面的專著，置年老體弱於腦後，傾力以赴，於是着手對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重作深入研究。他進一步精心檢查傳世的“郎官石柱”和徹底比勘勞格、趙鉞所作考證，着力解決兩個方面的問

題。其一，糾正各司題名的錯亂，致力在姓名的整錄，考定原題名之順序，各歸其本。其二，論證各司題名顛倒錯亂的各種原因，依據已鑑別的可信史實，於各郎官名下注其任官年代和事迹，辨析勞考的優劣，求得恢復或接近“郎官石柱”本來面目。仲勉先生十分珍惜時間，經常一天工作達十小時之久。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，剛就左司郎中迄至主客員外郎二十六個目寫完初稿時，便一病不起。同年七月，仲勉先生在醫院治病療養，纏綿病榻，依然口述一些補充材料，讓助手整理謄清，表示病愈後再加校訂，寫序成書付梓。不幸，重病不治，與世長辭，宏願未酬，以不克終卷為憾事。然而，值得慶幸，仲勉先生的最後一部學術巨著，經我整理續補填正完篇，斟酌著者生前原意，用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書名，於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。此書出版後，立即銷售一空，不少評介文章指出，岑仲勉先生悉心研究唐郎官石柱，累學鈍功，達三、四十年之久，前有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》，後有《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》，相照輝映，堪稱為唐史研究中的雙璧，更是唐郎官石柱研究的絕唱，享譽日隆。的確，仲勉先生積年的潛心探研，遍考金石著錄，印證史籍，細辨諱偽，排解前人的繆惑紕誤，廓清了因多次刻勒錯置等種種疑團，終於大致恢復郎官石柱的本來面目，作出了寶貴的貢獻。

岑仲勉先生治史四十載，著書十七種，論文近二百篇，凡一千多萬言，生平著作之多，在當代中國歷史學家當中較為突出。仲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四年，今年正是他的一百周年誕辰，遺著《唐人行第錄》、《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》、《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》和《金石論叢》四本，均已陸續刊行或再版，《岑仲勉史學論文集》經已編定，將由中華書局印刊，這對岑仲勉先生是個最好的告慰和紀念。同時，岑仲勉先生卷帙繁浩的學術著作，是留給我們文化學術方面

的寶貴遺產，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和研究。

一九八二年春於廣州中山大學

一九八五年春修改於香港寓所

岑仲勉主要著作目錄

- 佛游天竺記考釋 1934年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- 元和姓纂四校記（一、二、三冊） 1948年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- 西周社會制度問題 1956年 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又於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
- 黃河變遷史 1957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- 隋唐史 1957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
- 府兵制度研究 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- 兩周文史論叢 1958年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
- 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1958年 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
- 隋書求是 1958年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
- 墨子城守各篇簡注 1958年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- 突厥集史（上、下冊） 1958年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
- 唐史餘瀟 1960年 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 又於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
- 唐人行第錄 1962年 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 又於197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
- 中外史地考證（上、下冊） 1962年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
- 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 1964年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
- 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（上、下冊） 1981年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
- 金石論叢 198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- 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（陳達超編校） 1984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- 岑仲勉史學論文集（陳達超編校）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

目 錄

前言	1
岑仲勉先生傳略	1
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蹟	1
論《白氏長慶集》源流並評東洋本《白集》	26
補《白集源流》事證數則	168
《白氏長慶集》僞文	170
從《文苑英華》中書、翰林制詔兩門所收白氏文論《白集》	242
從《金澤圖錄》《白集》影頁中所見	254
《文苑英華辨證》校白氏詩文附按	270
《白集·醉吟先生墓誌銘》存疑	277
《賈島詩註》與《賈島年譜》	282
附錄：為賈島事李嘉言與岑仲勉辯答	301
《杜佑年譜》補正	306
李德裕《會昌伐叛集》編證上	342
論李德裕無黨及司馬光修《唐紀》之懷挾私見	462
《玉谿生年譜會箋》平質	477
《括地志序略》新詮	519
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“舊領縣”之表解	562